

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

侯怡利*

摘要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對中國古代政權來說，祭祀天地神祇與捍衛國家安全可謂同等重要。前者（祭祀）主旨在於證明其政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後者（軍事）則在保衛國家安全、社會安寧與人民安居。有鑑於此，古代中國歷代王朝藉著「大閱講武」的儀式，用以訓練國家軍隊並保持全民抵禦外侮的戒慎之心，可以說向來不遺餘力。

早在三代以前的統治王朝，即曾舉行過「大閱」之典；洎乎清室，仍有其制。尤其清廷自入關以前，即已有大閱之制；入關之後，更是屢經修訂，而使體制更趨完備。

至於乾隆四年的「大閱」，為乾隆皇帝即位後首次的大閱典禮。與前此歷代大閱典禮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這次隆重的大閱，透過當時宮廷畫家以畫筆如實地紀錄了下來。根據《石渠寶笈續編》，大閱圖應有四卷，所繪為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三於南苑舉行的大閱，四卷依序為「幸營」、「列陣」、「閱陣」、「行陣」，參與繪製的有金昆等十名宮廷畫家。

而在乾隆的御製詩中，曾針對「大閱」題詩，可以為他下令繪製這四卷〈大閱圖〉做一註腳——亦即〈大閱圖〉的繪製，正是即位初期的乾隆皇帝用來提醒自己，身為帝王之尊，不可忽視軍旅之事，因為「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故詩文曰：「承平詎敢忘戎事」；另方面乾隆皇帝也向天下臣民展示，他有著經營天下的雄心壯志，故詩文曰：「經國應知有大猷」——這也正是「大閱」典禮之所以必須舉行的宗旨。

關鍵字：乾隆皇帝、大閱、大閱圖

*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The research on a Grand Review ceremony in 1739 and “The Grand Review” in four handscrolls

Hou, Yi-li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a country are sacrificial rites and military affairs”. Both two are important for the ancient china regime. Sacrificial rites could give the regime legitimate position and military affairs would protect the safety of whole country. Therefore, emperors held a Grand Review ceremony to use to training the army and maintaining vigilance.

Grand Review ceremony had become a tradition for ancient China. The Ch’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custom of conducting a review once every three years. The system of a Grand Review ceremon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te.

The Ch’ien-lung Emperor,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time he held a Grand Review ceremony in the fourth year of his reign (1739). Not alike other Grand Review ceremonies in history, this time The Ch’ien-lung Emperor ordered Chin K’un and other court artists to paint “The Grand Review” in four handscrolls to record the ceremony. Four handscrolls according to priority are: “The Imperial Encampment,” “Battle Formation Lined Up,” “Reviewing Battle Formation,” and “Battle Formation on the Move.”

According to an imperial inscription, we believe “The Grand Review” has political purpose. First, the Ch’ien-lung Emperor wanted himself to be vigilant, never to ignore military affairs are important. Second, the Ch’ien-lung Emperor also wanted to show his great ambitious to rule the country.

Keywords: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Grand Review ceremony; “The Grand Review”

國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

侯怡利

一、前言

《尚書》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¹於此可知，我國古代歷朝歷代對於天地的祭祀、神祇的謨拜，實質意義就在於證明其政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而為了保衛國安全、社會安寧與人民安居，國防軍事上的建設，亦不可輕忽。

孔子有言：「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²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³凡此皆昭示我們，古代王朝對於國家軍隊，都負有訓練之責。而在我國古代農業社會中，國家若欲訓練士卒，必於農隙之時，方能不奪農時，故古語有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⁴即此義也。

司馬法有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⁵此所以我國古代王朝，常於農隙時日的仲冬之月，舉行「大閱講武」之典，一方面訓練士卒，他方面亦警惕於人「居安思危」的道理。

本文即擬探索中國古代王朝關於「大閱」的起源、發展與沿革遞嬗之趨勢；並配合乾隆四年（1739）的大閱典禮和日後繪成的〈大閱圖〉，來對此項「國之重典」稍作闡釋。

二、清代以前的大閱典禮

早在三代以前，古代中國朝廷即有著關於「大閱」的紀錄。如古本《竹書紀

¹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27〈成公十三年〉，P.755。

²何晏注，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13〈子路〉，P.181。

³《論語》卷13〈子路〉，P.181。

⁴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卷153〈兵考五·兵志〉，P.1336上。

⁵轉引自王欽若、楊億等編《冊府元龜》（臺北，大化書局，1984年），卷124〈帝王部·講武〉，P.653上。

年》，記載了商紂王四十三年，曾舉行大閱之禮，⁶或許《竹書紀年》的可靠性值得懷疑。但《周禮·夏官·司馬》云：「中冬教，大閱」；⁷且《尚書·周書·洛誥》正義曾引：「《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⁸《毛詩·國風·豳風·七月》正義亦曰：

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⁹

師古注此曰：「振旅，整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¹⁰似乎漢、唐學者都確認西周確曾舉行大閱之典——於此可知，我國古代至少自西周時代起，確有「大閱」之制。而《春秋公羊傳·恆公六年》亦曰：「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於此足證，春秋時代的諸侯國，確定已曾舉行過「大閱」之禮了。

漢初似無大閱講武之制，直到漢武帝平百粵後，才有「歲時講肄，修武備」之制；不過，漢元帝時，因接受了貢禹的建議，遂罷此制。¹¹惟前漢時代大閱講武的時間，大約都是在冬十月之際，¹²符合《周禮》仲冬大閱之規範。到了後漢年間，似乎卻將講武之制改在「立秋」的時候。

因爲依據《後漢書·禮儀志》的記載，後漢時規定：

立秋之日，（自）〔白〕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

其儀：乘輿 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

⁶ 方詩銘、王修齡輯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3年），P.233。

⁷ 鄭玄注，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29〈夏官·大司馬〉，P.774。

⁸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15〈周書·洛誥〉，P.419。

⁹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8-1〈國風·豳風·七月〉，P.501。

¹⁰ 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23〈刑法志〉，P.1082。

¹¹ 見《漢書》卷23〈刑法志〉載：「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P.1090。

¹² 據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1〈魏書·武帝本紀〉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三日），（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P.47），於此可知，漢代大閱講武的時間多在冬十月。

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駟)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¹³

於此可見，後漢時代是在立秋的時候，舉行大閱講武、演習陣法。此外，根據《三國志·魏書》的記載，不但後漢是在立秋舉行大閱講武之典，曹魏時代仍依後漢之制，在立秋大閱治兵。¹⁴故魏文帝在初嗣魏王之後，即於延康元年（220）六月辛亥（七日）立秋之日，閱兵於東郊。¹⁵

洎乎兩晉期間，或因飽受北方游牧民族之邊防威脅，故有關於「大閱講武」的舉行，有漸前增加的趨勢。如晉武帝在位年間，分別於泰始元年（265）十一月、四年九月、九年十一月丁酉（三日）、十年十一月庚午（十二日）、咸寧元年（275）十一月癸亥（十一日）、三年十一月丙戌（十六日）、太康四年（283）十二月庚午（五日）及六年十二月甲申（一日），八度舉行大閱；除了泰始四年的大閱是在秋九月舉行之外，其他六次都還是在冬季舉行。¹⁶而顯宗成帝亦於咸和元年（326）十一月壬子（二十六日），大閱於南郊。¹⁷

¹³ 見司馬彪原撰《續漢書·禮儀志》，現收入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志第五〈禮儀志中〉，P.3123。而《後漢書》注文在注釋「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驪」時，引《月令》曰：「天子乃厲(勅)〔飾〕，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P.3123）。《後漢書》注文在注釋「驅劉」、「乘之」時又曰：「《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關〕踢踞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P.3123~3124）。

¹⁴ 見《三國志·魏書·武帝本紀》載：「（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三日），（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奏可」，P.47。

¹⁵ 《冊府元龜》卷124〈帝王部·講武〉，P.653中。

¹⁶ 泰始元年十一月大閱，見《冊府元龜》卷124〈帝王部·講武〉，P.653中。泰始四年九月的大閱，則見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21〈禮志下〉（P.662）的記載之外；其餘六次均見《晉書》卷3〈世祖武帝本紀〉，P.63、64、65、68、75、76。

¹⁷ 《晉書》卷7〈顯宗成帝本紀〉，P.170。

據《晉書·樂志》的記載，晉代大閱之典，重視的是「文制其中，武不窮武」，故「禮成而義舉」、「進止不失其序」。¹⁸

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之下，即使是由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政權，亦有多位君主舉行過「大閱」，如漢（前趙）隱帝劉粲曾大閱於上林；¹⁹後趙太祖武皇帝石季龍兩度大閱於曜武場及宣武觀；²⁰成漢昭文帝李壽曾大閱於東場；²¹後秦文桓帝姚興亦曾兩度舉行大閱；²²南涼景王禿髮傉檀則大閱於方亭。²³不過，或許由於少數民族漢代還不夠深，以致於劉粲大閱的時間是在秋八月，²⁴似與《周禮》的規範有違。

南朝時代通常予人的印象是不修武備，而證諸此一時代「大閱」的次數，果然只有兩次，一是宋孝武帝大明七年（382）正月，²⁵一是陳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八月²⁶——而且這兩次大閱的時間，都不在仲冬之月。

相對於南朝的不修武備，北朝歷任君主卻極端重視軍事建設，因此從北魏道武帝開始，北朝君主多頻頻大閱講武，如道武帝首先在天興二年（399）七月大閱，²⁷明元帝在位期間，則大閱四次，講武一次；²⁸太武帝在位期間，大閱三次，講武一次；²⁹文成帝在位時，亦嘗閱武一次；³⁰孝文帝在位期間，曾大閱兩次，³¹講武、閱武各三次；³²且太上皇亦於延興五年（475）十月，大閱於北郊乙次；³³

¹⁸ 見《晉書》卷 23〈樂志下〉云：「順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鐃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闕武。惟闕武，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群。偃旌麾，班六軍。獻享蒸，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爵侯賢。饗燕樂，受茲百祿，壽萬年」，P.708。

¹⁹ 《晉書》卷 102〈劉粲載記〉，P.2678。

²⁰ 《晉書》卷 106〈石季龍載記上〉，P.2771、2774。

²¹ 《晉書》卷 121〈李壽載記〉，P.3045。

²² 《晉書》卷 117〈姚興載記上〉，P.2981、2986。

²³ 《晉書》卷 126〈禿髮傉檀載記〉，P.3150。

²⁴ 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晉紀〉，P。

²⁵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6〈孝武帝本紀〉，P.130。

²⁶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4〈嗣南康愍王方泰傳〉，P.212。

²⁷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太祖道武帝本紀〉，P.35。

²⁸ 明元帝大閱的次數，《魏書》有誤，今據《冊府元龜》卷 124〈帝王部·講武〉所載，P.653 下。

²⁹ 《冊府元龜》卷 124〈帝王部·講武〉所載，P.653 下。

³⁰ 《冊府元龜》卷 124〈帝王部·講武〉，P.653 下。

³¹ 孝文帝於延興四年（474）八月戊申（十日）大閱於南郊（《魏書》卷 7 上〈高祖孝文帝本紀上〉，P.140）；又於太和五年（481）九月庚午（十三日）閱武於南郊（《冊府元龜》卷 124〈帝王部·講武〉，P.654 上）。

³² 《冊府元龜》卷 124〈帝王部·講武〉，P.654 上。

³³ 《魏書》卷 7 上〈高祖孝文帝本紀上〉，P.142。

宣武帝則於景明三年（502）九月戊寅（二十三日），閱武於鄴南。³⁴而北周太祖宇文泰於西魏文帝大統年間專政時，曾四度大閱諸軍；³⁵北周武帝亦曾於建德三年（574）十一月戊午（二十六日），大閱於城東。³⁶於此可見，北朝諸帝王確實要比南朝各君主更重視國家武備。

隋代國祚不長，故僅見隋煬帝大業五年（609），³⁷曾舉行過大閱之禮。至於唐代，唐高祖首先於武德元年（618）十月辛丑（三十日），舉行大閱之典。³⁸太宗則曾於貞觀十五年（641）冬十月辛卯（三日），大閱於伊闕。³⁹高宗顯慶二年，曾大閱於許州講武臺，並將該地更名為「臨潁縣」。⁴⁰玄宗先天二年（713）十月癸卯（十三日），親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軍容堪稱浩大。而兵部尚書郭元振因軍容不整，玄宗怒而欲斬之於纛下，幸賴宰相劉幽求、張說一再跪求，玄宗始將郭元振配流新州；然而，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則因草軍儀有失，仍被斬於纛下。⁴¹從此一事證，益可知古代帝王對於大閱講武之儀的重視程度。

安史亂後，國家多事，故唐廷大閱的次數也漸有增加，如肅宗於即位之初的至德元載（756）八月，即曾於靈武舉行大閱；⁴²嗣後，又曾兩度舉行大閱之禮。⁴³而代宗先於即位之初的寶應元年（762）九月壬寅（二十六日），大閱兵馬於鳴鳳門；⁴⁴又於大曆九年（774）四月乙酉（十七日）郭子儀等大閱兵師以備吐蕃。⁴⁵從唐代後期大閱的時間，多非仲冬之月可知，當朝廷兵馬倥傯之際，「大閱」也常因備戰而刻意舉行，當然也就無法選擇農閒的仲冬之月了。

³⁴ 《冊府元龜》卷124〈帝王部·講武〉，P.654上。

³⁵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文帝本紀下〉，P.27、28、29、30。

³⁶ 《周書》，卷5〈武帝本紀上〉，P.86。

³⁷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61〈宇文述傳附見雲定興傳〉，P.1468。

³⁸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高祖本紀〉，P.8。

³⁹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3〈太宗本紀下〉，P.53。

⁴⁰ 《新唐書》卷38〈地理志二〉，P.988。

⁴¹ 《冊府元龜》卷124〈帝王部·講武〉，P.；惟在紀日上，《冊府元龜》有誤，應據《資治通鑑》卷210〈唐紀二十六〉，作「癸卯」（P.6687）。

⁴² 至德元載八月，肅宗在靈武大閱六軍，見《舊唐書》卷120〈郭子儀傳〉，P.3450。

⁴³ 肅宗又於至德二載（757）八月癸巳（十七日）、三載（758）正月庚寅（十七日），兩度大閱，見《舊唐書》卷10〈肅宗本紀〉，P.246、251。

⁴⁴ 《新唐書》卷6〈代宗本紀〉，P.167。

⁴⁵ 《舊唐書》卷11〈代宗本紀〉，P.304。

後梁太祖開平四年（910）十月壬午（二十六日），嘗於新化大閱軍實；⁴⁶又於乾化元年（911）八月戊寅（二十七日）和十月丙子（二十六日），兩度大閱。⁴⁷後唐莊宗於天祐十三年（916）八月出征邢州，天祐十五年（918）八月辛丑（一日）出征鄆、濮之前，兩度大閱軍容，⁴⁸於此益可知，「大閱」常被用做出征前誓師之典。後晉少帝開運二年（945）二月丙子（九日），大閱諸軍於戚城。⁴⁹後周世宗亦於顯德元年冬十月，舉行過大閱。⁵⁰

雖然，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九月辛亥（二十三日），即曾至講武臺大閱；⁵¹不過，在宋朝初年，大閱講武之制並無定制，大閱場所也不固定，只是常於秋九月舉行大閱之禮，如《宋史·禮志》所載。⁵²而且事實上，不僅宋初對於「大閱」並無定制，前此歷朝歷代似乎亦無定制；直到宋真宗時代，始有詔頒定「大閱」之規章：

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馮高為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衛二十里，諸班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賦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凱旋以退。乃召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鈞

⁴⁶ 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6〈梁書·太祖本紀六〉，P.91。

⁴⁷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梁太祖本紀下〉，P.19、20。

⁴⁸ 《舊五代史》卷28〈唐書·莊宗本紀二〉，P.388、391。

⁴⁹ 《舊五代史》卷83〈晉書·少帝本紀三〉，P.1011。

⁵⁰ 《舊五代史》卷114〈周書·世宗本紀一〉，P.1522。

⁵¹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太宗本紀一〉，P.56。

⁵² 《宋史》卷121〈禮志·軍禮·閱武〉曰：「閱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閱，與從臣登臺觀焉」，P.2830。

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士飲於殿門外。⁵³

於此可見，宋真宗不但規定在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為大閱廣場，並於廣場上建一閱兵的高臺及行宮；大閱當日，三更天時分，禁軍中的殿前、侍馬步兵就要至大閱場所侍衛；天明之後，皇帝始御大閱臺，東向而坐；由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黃、赤、青、白、黑），以節制進退。大閱完戍後，皇帝賜宴群臣，教坊奏樂；皇帝再到東華門巡閱諸軍，鈞容奏樂，皇帝再賜群臣飲酒。翌日，皇帝再賜飲群臣及參預大閱的諸軍——整個儀式堪稱繁複，這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正式頒佈的「大閱」規制和儀節。嗣後，宋神宗、高宗、孝宗又分別增添了部份大閱的內涵，⁵⁴但整個體例大致還是以宋真宗時候的規制為準。

在入侵中原的王朝中，遼太宗曾於天顯四年（929）冬十月庚戌（十五日），大閱六軍；⁵⁵元世祖亦於至元五年（1268）海都叛亂時，大閱天下⁵⁶——足見大閱講武之禮，這些少數民送族亦奉行不輟。

明太祖朱元璋曾於洪武六年（1373）三月戊申（六日）大閱天下，以備倭寇；⁵⁷成祖永樂年間，更曾頻頻大閱；⁵⁸而宣宗宣德四年（1429）的大閱，儀式甚簡；⁵⁹英宗正統年間則或閱於近郊，或閱於西苑，其儀制亦不著於令。⁶⁰至穆宗隆慶三年（1569）大閱時，⁶¹始定大閱之制：在大閱的前一天，皇帝就要在內殿行四拜禮，如出郊之儀；而總協戎政大臣則要率領巡視科道，督促各個將領軍士肅清校武場。大閱當日，免朝一天，皇帝親率文武官員校閱於閱武門外；當皇帝到達

⁵³ 《宋史》卷 121〈禮志·軍禮·閱武〉，P.2830-2831。

⁵⁴ 參見《宋史》卷 121〈禮志·軍禮·閱武〉，P.2831-2834。

⁵⁵ 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3〈太宗本紀上〉，P.30。

⁵⁶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34〈昔班傳〉，P.3247。

⁵⁷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太祖本紀二〉，P.28。

⁵⁸ 明成祖於永樂八年（1410）、十二年（1414）及二十一年（1423）數度大閱，其中永樂十二年就曾大閱五次，二十一年也大閱兩次，詳見《明史》卷 6-7〈成祖本紀二〉、〈成祖本紀三〉，P.87、93、101、103、104。

⁵⁹ 《明史》卷 57〈禮志·軍禮·大閱〉曰：「宣德四年十月，帝將閱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文武各堂上官一員，屬官一員扈從」，P.1438。

⁶⁰ 《明史》卷 57〈禮志·軍禮·大閱〉，P.1438。

⁶¹ 關於穆宗隆慶三年大閱的時間，《明史》卷 19〈穆宗本紀〉作「（隆慶三年九月）辛卯（二十一日）」，P.256。而《明史》卷 57〈禮志·軍禮·大閱〉則曰：「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時有大閱禮，乞親臨校閱。』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請行之。命於明年八月舉行。及期，禮部定儀」（P.1483），似乎大閱的時間隆慶三年八月。未知孰是孰非？暫時並列於此，稍俟後考。

行宮後，先賜酒飯，然後兵部尚書奏請大閱；當皇帝巡閱過列陣之軍士後，各級官員都要在閱武臺前比較射箭，騎馬射六箭，步行射四箭，射中箭靶者鳴鼓以報；最後再由皇帝檢視射箭成績後，兵部尚書奏報大閱禮成。當日，皇帝即針對各個備閱部隊的表現，賞優罰劣；然後，駕還行宮，奏「武成之曲」做成禮成回鑾樂章。大閱次日，總協戎政大臣再率領群臣謝恩。⁶²嗣後，神宗萬曆九年（1581）三月丙寅（三日）的大閱，⁶³一如隆慶故事，⁶⁴可見穆宗定制後，曾為後代皇帝所奉行。

三、清代的大閱典禮

清人在入關之前，太宗皇太極曾於天聰七年（1633）十月丙寅（七日）、八年三月己亥（十三日），⁶⁵兩度大閱；第一次的大閱仍與《周禮》仲冬之月大閱相符，第二次就有違《周禮》的規範了。不過，斯時尚無定制。

世祖順治十三年（1656）八月辛丑（二十六日），始定制每三年大閱乙次，著為令；⁶⁶而清代大閱之制，也就是在此時初次做出規範：

大閱規制，順治十三年議准。大閱講武，典至重也。自太祖太宗以來，舉行已久。今請酌古準今，三年一次大閱。閱畢，傳令大臣並侍 於御前較射、 賜燕。次日，諸王貝勒率文武各官上表稱賀，以昭大典。著為令。

67

據此可知，順治十三年定制時，不但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閱，並要求屆時所有大臣均應於御前比較射箭，再由皇帝賜宴。雖然如此，順治十三年似乎並未舉行過大閱之典；甚至到了順治十六年（1659），雖即使皇帝再申前令（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閱），言明將於當年秋月大閱，⁶⁸最後似乎仍未舉行。

⁶² 詳見《明史》卷 57〈禮志·軍禮·大閱〉，P.1438-1440。「武成之曲」則見《明史》卷 63〈樂志·隆慶三年大閱禮成回鑾樂章〉，P.1583。

⁶³ 《明史》卷 20〈神宗本紀一〉，P.268。

⁶⁴ 《明史》卷 57〈禮志·軍禮·大閱〉，P.1440。

⁶⁵ 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2〈太宗本紀一〉，P.43、45。

⁶⁶ 《清史稿》，卷 5〈世祖本紀二〉，P.146。

⁶⁷ 李鴻章等編修《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4 下。

⁶⁸ 《清會典事例》卷 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載：「（順治）十六年諭：『大閱典禮，三年一行，已永著為例。連年尚未修舉，今不得再緩。著即傳諭各旗官兵整肅軍容，候秋月朕親行閱視。爾部即詳察應行事宜，擇吉具奏。』」，P.764 下。

嗣位的聖祖康熙皇帝在位期間，雖然曾經十度舉行「大閱」之典，⁶⁹似乎卻並未在制度下建立具體的規模。

據《清會典事例》所載：

雍正六年奏准。大閱官兵數目、及器械營伍，均宜定有成規，以垂永久。

70

由此可知，清代關於「大閱」的定規，應是自世宗雍正皇帝任內，才真正開始定頒。包含參與大閱官兵的數目、器械、營伍，及應該如何列陣、如何行陣，都在雍正六年（1728）的上諭中，做出規範；雍正皇帝還規定，在大閱之前，各個參與校閱的部隊，都應該預期操練，並將列陣、行陣等進退行止步伍的概況，繪圖恭呈御覽，⁷¹於此可見雍正對於大閱之典重視的程度。

到了乾隆三年（1738），依據兵部的奏議，清高宗又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閱，事前由兵部擬具相關規定後請旨；而每逢大閱之年，亦由兵部擬具諸王、領侍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銜名具奏，由皇帝欽點王公大臣負責操演兵丁。⁷²

乾隆四年（1739）時，兵部又針對大閱的程序和儀節，奉准了更詳盡的規定，⁷³大致可以分為「幸營」、「列陣」、「閱陣」和「行陣」等四個步驟（詳見後文）。

乾隆十七年（1752），兵部奏准，凡八旗漢軍中管領藤牌的官員和散秩官，在大閱之年亦應入隊操演。⁷⁴乾隆二十年（1755），兵部又奏准關於大閱之時，鹵簿大駕的相關補充規定。⁷⁵

⁶⁹ 聖祖曾經先後在康熙十二年（1673）正月庚寅（十九日）、十六年（1677）二月甲子（十七日）、十九年（1680）二月丙子（十六日）、二十四年（1685）十一月甲戌（十八日）、二十六年（1687）二月癸丑（五日）、三十年（1691）五月己丑（四日）、三十一年（1692）九月壬申（二十六日）、三十二年（1693）十月壬辰（二十二日）、三十四年（1695）十一月庚辰（二十二日）及四十二年（1703）十一月己未（十八日），十度舉行大閱之典，詳參《清史稿》卷6-8〈聖祖本紀〉，P.184、194、202、218、221、232、236、238、242、264。

⁷⁰ 《清會典事例》卷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5上。

⁷¹ 詳參《清會典事例》卷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5上-768下。

⁷² 《清會典事例》卷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8下-769上。

⁷³ 大閱程序見《清會典事例》卷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9上-770下；大閱儀節見大閱程序見《清會典事例》卷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70下-775下。

⁷⁴ 《清會典事例》卷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76上。

⁷⁵ 《清會典事例》卷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76上。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兵部再次奏准關於大閱官兵的數目，⁷⁶較諸雍正六年的定制，頗有增加；同時，也對大閱時候各陣營的前後左右距離，作出規範。⁷⁷其中與雍正六年大閱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雍正六年時自鹿角排列處至閱武臺凡「二百九十七丈五尺」；而乾隆三十九年，則規定自鹿角排列處至閱武臺僅「一百七十五丈」，可能是因為雍正定制的距離太遠，以致皇帝在閱武臺看得並不清楚，因此乾隆才將距離縮短了一百二十丈五尺。

從乾隆年間數度對於大閱體制作出新的規範或補充規定，我們可以知道，乾隆皇帝對於「大閱」之典是十分重視的。而乾隆在位期間，也曾四度舉行大閱典禮，⁷⁸是清代皇帝中僅次於康熙皇帝者。

從嘉慶十六年（1811）的上諭可知，雖然清廷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閱，但仁宗即位十六年內，從未舉行過任何一次大閱，⁷⁹可以說有違祖制。因此，嘉慶終於在次年（1812）三月壬辰（二十日），於南苑行園舉行大閱。⁸⁰在此次大閱後，嘉慶皇帝除了依例賞賜各個參加校閱的部隊之外，⁸¹由於這次大閱從鹿角排列處至閱武臺是「一百九十五丈」，讓皇帝看得不是很清晰，故嘉慶又規定此後從鹿角排列處至閱武臺應為「一百六十丈」，並著為定制。⁸²惟值得注意的是，嘉慶十七年的大閱，自鹿角排列處至閱武臺的距離（一百九十五丈），既非雍正六年亦非乾隆三十九年的定制，不知何以致此？

無論如何，自嘉慶舉行過大閱之典以降，嗣後清廷歷任皇帝再也沒有舉行過任何一次「大閱」了——晚清國力的不振，或許肇因於此吧。

⁷⁶ 《清會典事例》卷 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76 上-780 下。

⁷⁷ 《清會典事例》卷 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80 下-781 上。

⁷⁸ 這四次分別是：乾隆四年十一月丙午（三日）、八年（1743）九月乙巳（二十六日）、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戊子（五日）、二十八年（1763）正月丁卯（九日），見《清史稿》卷 10〈高宗本紀一〉（P.363、377）及卷 12〈高宗本紀三〉（P.445、463）。

⁷⁹ 《清會典事例》卷 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載：「嘉慶十六年奉旨。國家閱兵大典，每年十月內閱兵大臣等看視後，照例奏聞。朕臨御十六年以來，尚未親行閱看。但念十月時候，天氣寒冷。朕自明年恭謁東陵禮成後，於三月二十日，在南苑照例親行閱看。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P.781 下。

⁸⁰ 《清史稿》卷 16〈仁宗本紀〉，P.601。

⁸¹ 見《清會典事例》卷 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81 下-782 上。

⁸² 《清會典事例》卷 705〈兵部·大閱二·大閱規制二〉，P.782 上。

四、乾隆四年的大閱與〈大閱圖〉

如前所述，乾隆四年大閱典禮與歷來所舉行大閱不同之處，在於這次隆重的大閱，透過當時宮廷畫家以畫筆如實紀錄，如同紀錄片一般。因此回溯此次大閱，除了史籍文獻的記載外，還有〈大閱圖〉可以相互參照，如此對大閱典禮的進行更有不同以往的認識。

（一）大閱圖的製作

首先，在正式探討〈大閱圖〉的內容前，先說明〈大閱圖〉的製作。根據《石渠寶笈續編》，大閱圖應有四卷，所繪為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三於南苑舉行的大閱，四卷依序為「幸營」、「列陣」、「閱陣」、「行陣」，參與繪製有：金昆、程志道、吳桂、程梁、姚文瀚、盧湛、張廷彥、金聲、丁觀鵬、陳永价等十名宮廷畫家，負責題記的則是梁詩正、汪由敦、張若靄、莊有恭四人。卷末有隸書題名，楷書書跋文。⁸³其中「幸營」與「行陣」已下落不明。存世僅有兩卷，根據畫上所題分別是〈大閱第二圖列陣〉（縱 68 公分，橫 1757 公分），目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及由私人收藏的〈大閱第三圖閱陣〉（縱 68 公分，橫 1550 公分）。所紀錄的是大閱典禮當日八旗兵軍容壯盛的場景。

關於〈大閱圖〉的製作年代，根據《活計檔》⁸⁴的記錄，應是在乾隆九年（1744）七月二十三日：

……太監胡世傑傳旨，春雨舒和現畫大閱圖，據金昆稱說三十年方能畫得，著怡親王海望安寧問明金昆，按年分僱人幫畫，造辦處畫樣人亦著幫畫，限三年要得……。⁸⁵

可知乾隆下旨，交由宮廷畫家金昆負責，並僱用其他畫家共同繪製，並限期在三年內完工。正如《石渠寶笈續編》所記，這四卷大閱圖「其鹵簿、扈從、器械、營制、陣式具詳」，⁸⁶即對大閱當時所有的細節皆巨細靡遺描繪。

⁸³ 〈大閱圖〉四卷，收入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冊四（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年），P.1871。

⁸⁴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所藏清雍正元年（1723）至宣統三年（1910）的內務府造辦處有關活計成做的檔案，即本文所稱《活計檔》。

⁸⁵ 《活計檔》，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畫院處〉。

⁸⁶ 〈大閱圖〉四卷，《石渠寶笈續編》，冊四，P.1871。

但在乾隆十一年閏三月時，發生了一段插曲：

二十二日太監高玉傳旨，花善料理何事之人，至於大閱圖畫錯，著怡親王海望治罪，金昆飾非文過，所交之事皆錯並不管事，著革職將伊所食錢糧停止，俟大閱圖告竣之時再行請旨，欽此。⁸⁷

由這兩段紀錄可知，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當大閱圖畫錯，主導繪製的金昆企圖掩飾被發現後，乾隆下旨先停發金昆所食錢糧且革除職務，等大閱圖完工後再請旨決定如何處分。至於監督宮廷畫家繪畫的催總花善的處分則交由怡親王海望處置，於是四日後，即二十六日而有以下的處分：

……催總花善，乃係派出監看大閱圖之專員，理宜敬謹小心監看畫畫人等恭畫，今將大閱圖旗分畫錯並不詳細查看，甚屬不合，應將花善所食俸祿停止，亦俟大閱圖告竣之時一併請旨。⁸⁸

可知金昆等人是把八旗位置擺錯，負責監看的花善卻未及時發現，因此同樣對他停發俸祿，等大閱圖竣工之時兩人一並處分。數日後又傳旨：

於閏三月二十七日太監高玉傳旨，著傳與怡親王海望，大閱圖改完時，將金昆所食錢糧賞給一半，花善俸祿賞給一半，俟大閱圖告竣時，將金昆所食錢糧並花善所食俸祿全行賞給，欽此。⁸⁹

五日後，乾隆再度下旨從輕處分，兩人可於大閱圖修改完成先恢復所食糧俸祿一半，等到大閱圖竣工之時，才恢復全額的食祿。不過乾隆十二年五月兩人的食糧俸祿提前恢復全額。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初六日，⁹⁰歷時近五年的〈大閱圖〉總算繪製完成。

（二）大閱典禮的進行與〈大閱圖〉的內容

乾隆四年的「大閱」程序，實際應包含了事前的準備工作在內。據《清會典事例》所載，在「大閱」舉行的三個月前，就必需由負責天文曆象的欽天監挑選閱武之吉日，再由兵部向皇帝稟報並獲得御旨批可後，整個大閱的準備工作乃正式展開。首先，八旗諸營必須開始修整戎器、甲冑；到了典禮舉行的兩個月前，

⁸⁷ 《活計檔》，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二十二日，〈記事錄〉。

⁸⁸ 《活計檔》，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記事錄〉。

⁸⁹ 《活計檔》，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二十七日，〈記事錄〉。

⁹⁰ 《活計檔》，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記事錄〉。

各旗更要分別在原駐紮地開始操練大閱時的行陣之法。舉行大閱的前一個月，就要由兵部整理大閱操場，所有的統軍將帥則在此一場所進行實地演練。⁹¹

〈大閱圖〉四卷所繪則以乾隆皇帝參與為主，重點式的以連續分段方式來記錄大閱典禮的整個過程，雖然「幸營」與「行陣」兩卷下落不明，但透過《石渠寶笈續編》中所錄畫上的跋文，可以對佚失這兩卷的內容有所了解。

〈大閱第一圖幸營〉，卷末題有：

乾隆四年，歲在己未，冬十有一月甲辰朔，……，皇帝大閱八旗將士於南苑，先期三日，上具吉服，出正陽門，鹵簿大駕全設，鑾儀衛官陳鼓角象輅於南苑北紅門之北，以次以南，……，御馬十有二，上駟院執事者，騎而馭之，九龍曲柄繖一，武備院執事者，一人騎而執，一人騎而引，中道行，前引大臣十人，具禮服佩刀，騎而前導，上御萬吉驢，按轡以行，……，考之前載，甘泉鹵簿，蠶畧 綏，漢官屬車，千乘萬騎，皇朝建中立制，省煩靡而肅羽衛，明典則而備儀章，祿威盛容，具見於此云。⁹²

根據跋文，說明本次大閱於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三舉行，三天前也就是十月三十日，乾隆由正陽門出宮前往北京城南約十公里處的南苑舊衙門行宮，如前所述大閱典禮是國家重大典禮之一，因此皇帝出巡的儀仗隊伍是用大駕鹵簿，更精確的說是騎駕鹵簿。⁹³所以卷末題跋中則清楚詳列所有騎駕鹵簿的規制，將所有禮樂器、旗幟、隨行的人數依序列出。

〈大閱圖〉對於典禮進行中的所有細節皆詳盡的描繪，此處用繪製時間稍晚內容雷同的〈乾隆南巡圖卷〉第十二卷為範本，圖中所繪為乾隆回京的場面，畫中陳設騎駕鹵簿，乾隆乘輕步輿（圖1），據此可推測〈大閱第一圖幸營〉的構

⁹¹ 《清會典事例》704〈兵部·大閱一·大閱規制一〉，P.769上。

⁹² 〈大閱圖〉四卷，《石渠寶笈續編》，冊四，P.1871-1872。

⁹³ 根據《清史稿》所記「皇帝大駕鹵簿，圓丘、祈穀、常雩三大祀用之。大閱時詣行宮，禮成還宮，亦用之。」有其詳盡規制，參看《清史稿》卷150〈輿服志四〉，P.3084。至於「騎駕鹵簿」：「騎駕鹵簿巡方若大閱則陳之。其制，前列鑾歌大樂，間以鑾歌清樂，器用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口角八，雲鑼二，龍簫二，平簫二，管二，笙二，銅鼓四，金二，銅點二，銅鈸二，行鼓二，蒙古角二。次御仗六，吾仗六，立瓜、臥瓜、星、鉞各六。次五色金龍小旗十，五色龍纛十。次單龍赤團扇六，雙龍黃團扇六，五色花傘十。次豹尾槍十，弓矢十，儀刀十。次九龍曲柄黃華蓋一。皆在皇帝輕步輿前，若乘馬則在馬前。次前引佩刀大臣十人，後扈佩刀大臣二人，輕步輿在中。次豹尾班侍執槍十人，佩儀刀十人，佩弓矢十人，殿以黃龍大纛。駐蹕御營，朝陳蒙古角，夕陳鑾歌樂。大閱則陳鹵簿於行宮門外。」《清史稿》卷150，〈輿服志四〉，P.3088

圖可能與此相類，不過所繪建築應為南苑北紅門，而乾隆是騎著萬吉驕而非乘輕步輿。至於乾隆及隨駕的王公文武大臣的隊伍，則可由本文稍後詳述〈大閱第三圖閱陣〉中閱陣隊伍來推想。

按起居注記載，十月三十日乾隆抵達舊衙門行宮，接著兩天行圍狩獵，十一月初二則轉駐蹕南紅門行宮，⁹⁴十一月初三，大閱典禮正式舉行，當日黎明時賜酒食給參與校閱的官兵，日出時所有八旗大營的官兵披上甲冑，依序排列，則是所謂「列陣」。將存世兩圖相互比較，可以看出〈大閱第二圖列陣〉（圖2）與〈大閱第三圖閱陣〉（圖3）其實在內容上是大致相同，均描繪八旗營伍列陣的全貌，而〈大閱第二圖列陣〉所有八旗軍隊的士兵均面向觀者（以畫作論之則為南面），長卷中軸分為左右四旗大營（面對畫作右為東、左為西、上為北、下為南），左四旗以中軸為準由西而東依序是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右四旗則同樣以中軸線為準由東而西則為正黃旗、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所有八旗大營的組成分成三列，左四旗以正藍旗為例（圖版4），同樣由西往東，最前方為漢軍火器營、漢軍火器營礮位、滿洲護軍火器營、滿洲火器營；中間則是滿洲前鋒營、滿洲護軍營與滿洲驍騎營；最後則是滿洲護軍次隊與滿洲驍騎次隊並列。右四旗則是由東往西但排列方式如同上述，全圖前後則有兩翼軍隊分別列於左右四旗大營的最後方，是由驍騎營與護軍營組成，次序與四旗大營相同。根據〈大閱第二圖列陣〉卷末所記：

通八旗大臣將校兵丁之列，行陣者、統率者、執事給使者，凡大臣四十有九人，將校者千四百九十二人，兵二萬九十有四人，其列於圖者，大臣官校九百四十有四人，得十之六，而嬴兵萬六千二百八十人，得十之八。⁹⁵

可知參與此次列陣的大臣將兵共有二萬一千多人，被畫入長卷中的大臣將兵有一萬七千多，圖中所繪列陣對伍人員編制，穿戴的甲冑，攜帶的兵器槍砲，以及各類旗幟的型制都在卷後有詳盡描述，相互參看可以領會宮廷對重大事件紀實畫的寫實程度以及對細節描述的仔細，同時也符合清代的大閱規制。

當準備接受大閱的八旗列陣完畢之後，接著下來兵部堂官恭請乾隆皇帝由行

⁹⁴ 呂堅、賓長初、蔣曉玉著，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冊四，P.248-253。

⁹⁵ 〈大閱圖〉四卷，《石渠寶笈續編》，冊四，P.1873。

宮前往校閱場地，此時，皇帝自行宮騎著著名的「萬吉驪」，並由武備院執事之人掌曲柄黃蓋旗前行，兵部堂官二人前引，大臣十人分左右騎前導，內大臣二人緊隨其後；而護領侍衛內大臣則率領眾侍衛跟隨在皇帝身後，貼身保護皇帝。整個行列前後共五列，依序雁行；除了不設鹵簿，其餘儀節均與皇帝幸營之儀式相同。隨後抵達類似今日的觀禮台，即晾鷹臺，⁹⁶上面還設有供皇帝觀禮與休息之用的黃幄與帳殿，在〈萬樹園賜宴圖〉（圖5）中可以清楚看到黃幄與帳殿的樣子。所有隨行官員依序站好，等乾隆入帳殿換好大閱甲冑後，所有隨行閱陣的王公大臣侍衛等皆穿上甲冑。隨即皇帝馭馬親臨校閱八旗行軍布陣的陣式。閱陣隊伍就如同皇帝自行宮來到晾鷹臺時，所以觀看此卷的閱陣隊伍的同時，可以想見〈大閱第一圖幸營〉的部分，除了沒有大架鹵簿外，隨行人員也沒有穿上大閱甲冑。閱陣隊伍自左翼而入，由右翼而出，通過八旗軍隊第一、二列之間。當皇帝經過各個備校部隊之前，陣前的將校甲兵，均在行列中迴身以向北面對閱陣隊伍，等到御駕通過之後，才轉回面對南方。皇帝閱陣完畢之後，就回到晾鷹臺。上述程序稱為「閱陣」。

與〈大閱第二圖列陣〉對照，〈大閱第三圖閱陣〉則是多了乾隆的閱陣對伍穿越八旗大營中間，所有士兵均迴身面向閱陣行列，目光焦點則都集中在戎裝馭馬的乾隆（圖6）。畫面正中所描繪的乾隆皇帝的閱陣行列正通過上三旗的面前（正白、鑲黃、正黃），其中年方二十九歲的乾隆，臉上蓄小鬚，身穿大閱盔甲，英姿勃發的騎著萬吉驪，雖然這個畫像僅有五公分左右的高度，與繪製年代相近的乾隆肖像相比，如日本藤井有鄰管藏郎世寧與唐岱合畫的〈春郊閱駿圖〉（圖7）對照，僅管〈大閱圖〉中乾隆畫像的尺寸極小，但對乾隆面貌的描繪極為寫實，身上甲冑及所有配件的細節也毫不含糊。

〈第三圖閱陣〉中乾隆所騎乘的萬吉驪，被乾隆譽為十駿之首，也可以從王致誠所繪〈十駿馬圖〉冊中找到牠的畫像（圖版8）。圖中在整個閱陣行列中，擔任前導的是「武備院執事者，張曲柄黃蓋，騎而行」（圖版9），由放大的圖版可以看出，所有的細節都精緻的描繪，不僅如此，面貌也相當寫實；跟在乾隆身

⁹⁶ 晾鷹臺位於南紅門行宮西北，高六丈，周長一百七十二丈。于德源著，《北京歷代城坊、宮殿、苑囿》（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7年），P.220。

後的王公文武大臣（圖版 10），均身著朝服，每個人的面容身型均不相同，或胖或瘦、或蓄鬚，有的還在相互交談；就連所乘坐的馬匹有多種毛色。可以看出這些宮廷畫家集體努力將這次隆重的大閱典禮忠實呈現，就如同今日的實況報導般有趣生動。

就以現存的兩卷來看，畫卷長達十五公尺，以鳥瞰的角度綜觀整個列陣與閱陣時的情況，畫中採用西洋透視技法以及寫實手法，設色鮮豔華麗，充分顯露盛清宮廷的繪畫風格。綜覽全圖有如親臨閱陣大典，同時也對八旗軍隊的組成、裝備與服飾有著清楚的認識。儘管畫中人物只有四公分左右的高度，仍可看出這些宮廷畫家對細節的描繪是那麼地一絲不苟。

當乾隆皇帝回到黃幄中上寶座後，賜諸王坐於黃幄中，諸大臣賜作黃幄之旁。緊接著就由兵部大臣奏請鳴螺，由帳殿前開始依次傳遞至鹿角兵處則擊鼓，開始「行陣」，昇鹿角，整列前進。每次前進十丈，鳴金而止，麾紅旗則礮槍齊發，鳴金而止；接著重覆上述，再次鳴鑼擊鼓，前進，鳴金，麾紅旗，發槍礮，如此前進十次。接著八旗開鹿角成八門，由首隊前鋒營、護軍營、驍騎營依序出鹿角外，次對隨之，火器營列於後，依序而出的軍隊排成列，鹿角門關閉。接著所有軍隊呼噪而進，兩翼協隊以雁行方式一同前進，軍中鳴金而止，等到再次鳴螺所有軍隊乃振旅而退，回到原來列陣之地，整個「行陣」的程序完成。而大閱儀式也就正式結束，最後由兵部堂官奏報「大閱禮成」。於是，皇帝回到帳幄中釋去甲冑，隨即啓程返回行宮，一切皆行禮如儀。當日皇帝賜宴給參與校閱的八旗軍隊。

雖然〈大閱第四圖行陣〉已佚，藉由卷末的跋文與其他典籍參照，大致可理出「行陣」的程序，試想當槍礮齊鳴，兩萬多人的軍隊齊聲呼叫並一同前進，是多麼壯觀的場面，也因此清高宗起居注中記錄行陣當時是「聲震山谷，烟颿騰涌，向前趨進時，官兵齊聲發喊，軍威嚴整」，⁹⁷可以想見當日軍威壯盛的浩大場景。

事實上，乾隆皇帝對這次大閱成果亦十分滿意，因此在給總理大臣一道諭令中云：

武備一道。乃國家緊要之事。務於平素。演習技能。整齊器械。講究兵法。

⁹⁷ 《乾隆帝起居注》，冊四，P.251。

使成健壯。皇考以武備關係甚重。蒙頒訓諭。雍正六年閱兵之時。皇考施恩王大臣官員、以及兵丁。皆有賞賜。朕敬遵皇考聖意。定為三年一次閱兵。今看閱各兵。進退整齊。朕甚喜悅。著交總理大臣等。照雍正六年之例。查明奏聞賞給。尋加賜在事大臣官員等貂皮、銀、俸、及兵丁等銀、有差。⁹⁸

由這道諭令可知乾隆深刻體認武備對國家的重要性，也了解大閱典禮的舉行正是要官兵能透過操演而有所警惕。因此乾隆按雍正六年時的規定，定三年一次閱兵，同時這次校閱中，所有士兵進退整齊，令乾隆讚賞不已，所以要求總理大臣按雍正六年那次大閱後的賞賜之例，也賞賜慰勞這次參與大閱典禮的各大臣官員與士兵。

雖然乾隆又再度重申三年一校之例，然其在位的六十年間，真正按規制所舉行的大閱典禮卻只有在乾隆四年與二十三年舉行過，乾隆四年的這次大閱藉由〈大閱圖〉四卷記錄下來，而二十三年的大閱則是於典禮舉行前，要求郎世寧畫〈乾隆大閱圖軸〉，將乾隆四年大閱時的馬上英姿，透過郎世寧的畫筆如實的呈現，一方面紀念，另一方面則有重申武備之要的深遠意涵。

五、〈大閱圖〉繪製的相關問題

（一）〈大閱圖〉、〈木蘭圖〉與〈親蠶圖〉

乾隆年間如大閱圖這類以記錄國家重大典禮的巨幅畫組，除了〈大閱圖〉的「幸營」、「列陣」、「閱陣」、「行陣」四卷外，尚有〈木蘭圖〉與〈親蠶圖〉，且都以四卷方式，其中〈木蘭圖〉四卷所描繪乃是乾隆六年（1741）首次在木蘭圍場舉行秋獮的景況，⁹⁹四卷依序為「行營」、「下營」、「筵宴」、「合圍」；〈親蠶圖〉所繪則是乾隆九年（1744）由孝賢皇后主持清代第一次的親蠶儀式，四卷依序是「詣壇」、「祭壇」、「採桑」、「獻蠶」，這三種巨幅畫組都將典禮以分段的方式進行，其中第一卷都以典禮主持人抵達典禮所舉行場為畫作重心，接著都以典禮會

⁹⁸ 清仁宗勅撰《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冊二（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P.564下-565上。

⁹⁹ 畢梅雪、侯錦郎著，《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

場為描繪主題，第三第四卷均是繪製典禮進行主要場景，四卷的鋪陳有一慣的手法，這可能與主持繪製的人都是金昆有關。

根據《活計檔》，可以看出〈大閱圖〉四卷於乾隆九年下旨命金昆等人繪製，完成於乾隆十四年，以開始製作的年代上看，是乾隆年間這類大型紀實畫作的開端，因此這三組畫作在構圖上有一致性，對於典禮的進行採重點式的記錄，並且以典禮主持人（皇帝或皇后）為畫作的核心。至於〈木蘭圖〉的繪製，乾隆十三年四月有記錄：

二十七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催總花善，七品官赫達子，金昆等押帖一件，內開為本月初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著金昆畫親蠶圖四卷，照木蘭寬窄尺寸，先起稿呈覽，欽此。¹⁰⁰

可見下旨繪製〈木蘭圖〉要早於〈親蠶圖〉，至於開始繪製時間應該是晚於〈大閱圖〉的乾隆九年。《活計檔》有條記錄，可知〈木蘭圖〉完成的時間：

三月初二日，西洋人席澄源辨認幼饌石，托裱《木蘭圖手卷》四卷。¹⁰¹據此可知，十四年三月初二時〈木蘭圖〉已繪製完成。完成時間上還早於〈大閱圖〉的五月初六。〈親蠶圖〉卷末有乾隆十六年的乾隆御題，所以至少在此之前已繪製完成，因此可以看到這三件巨幅畫組在創作時間上，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同時進行，而先後完工。

三件巨幅畫組所記錄的都是乾隆即位初期所舉行國家重大典禮的紀實畫作，且都有著深刻的政治意含，「大閱」是藉由檢閱國家軍隊來警惕皇帝與臣民，即使在承平之時也不忘隨時保持戰鬥精神，同時修整武器裝備；「木蘭」則是每年秋季舉行，目地在提醒滿族子弟，不要忘記祖先的遊獵騎射精神；「採桑」則是由皇后主持，藉由此一儀式，讓婦女勤於農桑，除了在題材上分別描繪這類國家重要典禮外，繪制的模式也相類似，都是分段紀錄這些活動的進行，這些典禮的實際舉行在軍事、民族傳統、民生上有重大意義外，更有新皇帝即位之後，透過典禮儀式之舉行，展現天子威儀，更有意昭告天下，乾隆皇帝積極期望有所作為的雄心壯志。因此才在前後七八年中，才陸續下令繪製，除了紀念更有政治上

¹⁰⁰ 《活計檔》，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如意館〉。

¹⁰¹ 《活計檔》，乾隆十四年三月二日，〈裱作〉。

宣示的意含。

此外，這三組畫作皆以金昆（生卒年不詳）為實際主持繪製的負責人，金昆對於國家重要典禮的相關規制似乎十分嫻熟，因為除了主持上述畫作的繪製，此後還在乾隆十三年主持〈鹵簿大駕全圖〉的繪製，¹⁰²在主持這類典禮畫作繪製後，繪製〈鹵簿大駕全圖〉，當推金昆無疑。

（二）〈乾隆皇帝大閱圖〉

同為紀錄大閱典禮的畫作，尚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郎世寧所繪油畫的〈乾隆大閱圖軸〉（圖 11），根據《活計檔》與乾隆御製詩，郎世寧〈乾隆大閱圖軸〉繪於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或者因為畫中馬匹之毛色與〈十駿圖〉之駿馬並不相同，因此被認為是紀念乾隆二十三年的大閱而作，¹⁰³然而畫中乾隆所穿大閱盔甲，上鑲嵌有紅藍寶石，根據《皇朝禮器圖式》乾隆大閱胄、甲有二，其中皇帝大閱胄一上頭鑲有紅藍寶等各色寶石，皇帝大閱甲一其上亦飾有紅寶石；至於皇帝大閱胄二與皇帝大閱甲二則作於乾隆二十一年而作，甲胄上以東珠替代原來的各色寶石，¹⁰⁴可見此掛軸所繪應是第一次舉行大閱典禮時正值青壯年的乾隆，正如〈大閱圖〉雖然所繪為乾隆四年之事，但成畫時間卻已遲至乾隆十四年。

再將此軸與〈春郊閱駿圖〉、〈木蘭圖〉（圖 12）以及〈大閱第三圖閱陣〉中乾隆肖像相比，以容貌與蓄鬚的特徵看，這幾幅肖像確實有著許多共通與相似之處。尤其與〈大閱第三圖閱陣〉不僅所穿大閱盔甲的特徵相同，構圖也極為相似，僅是左右對調而已，有趣的是郎氏所繪〈乾隆皇帝大閱圖〉畫幅長度達 322.5 公分，應是按人物與馬匹實際大小所繪製，而〈大閱第三圖閱陣〉中的乾隆畫像卻只有 5 公分，一大一小，一左一右，形成了有趣的對比。至於軸中乾隆御馬的毛色，據〈大閱第一圖幸營〉卷末所題：「御馬十有二，上駟院執事者，騎而馭之」，可見光是參與乾隆四年大閱的御馬就有十二匹，因此畫中所騎的花馬與所謂〈十

¹⁰² 《活計檔》，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畫院處〉。

¹⁰³ 劉澍，〈《從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4（北京，故宮博物院，2000 年），P.15-26。

¹⁰⁴ 不僅是大閱胄甲，其他大閱相關的用具如皇帝所戴的大閱配刀、弓、箭以及囊韃等都有圖示之，可與大閱圖中乾隆畫像比對。甚至其他如鹿角、金、海蟲(螺)等，書中亦有圖示，有助於對大閱典禮的認識。參見（清）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卷十三〈武備一〉，收入董浩等纂修《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 年），第二十冊，P.20-1-20-17。

駿圖》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也並非列入〈十駿圖〉之中。

〈大閱圖〉雖沒有郎世寧落款，但若將〈大閱第三圖閱陣〉中的乾隆畫像與畫中騎馬王公文武大臣比較，筆法水準上似乎有段差距，尤其馬匹的處理上明顯不同，其中乾隆所騎的白馬，一如郎世寧所繪的各類駿馬，儘管尺寸縮小，但馬匹臉部細膩的描繪以及身體比例的均衡，是畫中其他馬匹所不能比擬。又與〈木蘭圖〉第一卷行營中騎馬的乾隆相比，無論乾隆的臉部或者坐騎的畫法，都與〈大閱第三圖閱陣〉相類，而且〈大閱圖〉與〈木蘭圖〉繪製時間相近，再與〈乾隆大閱圖軸〉參看，乾隆的臉部幾乎是一模一樣。因此〈大閱第三圖閱陣〉中的乾隆騎馬像，很有可能是出自郎世寧之手，或者是根據郎世寧的草稿繪製，而成畫較晚的〈乾隆大閱圖軸〉有可能是以〈大閱第三圖閱陣〉為底稿，來加以繪製。至於實情如何，仍待進一步的史料佐證。

六、結 論

「大閱」之典，是我國古代朝廷利用仲冬農閒之際，集中訓練人民精進武技，並保持人民「居安思危」的心態，俾能保家衛民，捍衛國土。因此，早在三代以前，古代中國朝廷即有著關於「大閱」的紀錄；若就比較可靠的史料記載看來，我國至少從西周時代開始，已確定曾舉行「大閱」之典。

進入帝制時代的中國，自漢代以迄清朝，歷代朝廷多有其制，且從早期的仲冬大閱講武，逐漸演化為除了固定的大閱之外，若逢外寇入侵或朝廷有意對外征伐前夕，均可用「大閱」的儀式來號召天下、振奮軍心。

因此，「大閱」的時間，從《周禮》所載的仲冬之月（十月），到後漢時代已改為秋九月或秋月，南北朝以降則時間更不固定地朝向多元化發展，有在春季（正月至三月）舉行者（如魏文帝、南朝宋孝武帝、北魏明元帝、北魏孝文帝、唐肅宗、後晉少帝、明太祖、明神宗、清太宗、清聖祖、清高宗、清仁宗）；有在夏季（四月至六月）舉行者（如魏文帝、北魏明元帝、北魏太武帝、唐代宗、清聖祖）；而在秋季（七月至九月）舉行者最多（如晉武帝、北魏道武帝、北魏太武帝、北魏孝文帝、北魏宣武帝、南朝陳宣帝、唐肅宗、唐代宗、後梁太祖、後唐莊宗、宋太宗、清聖祖、清高宗）；不過，還是有不少帝王是選擇在冬季（十月

至十二月）舉行大閱之禮（如晉武帝、北魏明元帝、北周武帝、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後梁太祖、遼太宗、明世宗、清太宗、清聖祖、清高宗）。

就儀制、體例來看，在北宋真宗以前，似乎歷代朝廷對於大閱之禮尚無定制，從宋真宗開始，才有比較具體的規制，歷經宋神宗、宋高宗、宋孝宗及明穆宗的多次變革，體例漸全。

至於清代的「大閱」之典，至少經過了世祖、世宗、高宗及仁宗等四朝的變革，其中乾隆皇帝在位期間，規制最多，於此亦可見乾隆皇帝對於「大閱」之典重視程度於一斑。

本文主軸乾隆四年的〈大閱圖〉，最大的特徵就在於針對乾隆四年的大閱典禮，依據乾隆皇帝的御旨，由多位宮廷畫家用畫筆將此次大閱的過程完整的紀錄了下來。雖然該幅〈大閱圖〉今已不全，但我們尚能透過殘卷的記載，略窺當年乾隆皇帝英勃發及校閱部隊軍容浩大的景況。

在乾隆的御製詩中，曾針對乾隆四年的「大閱」典禮題詩，可以為他下令繪製這四卷〈大閱圖〉做一註腳：

時狩由來武備修。特臨南苑肅貔貅。龍驤選將頗兼牧。天駟掄才驥共驄。
組練光生殘雪映。旌旗影動朔雲浮。承平詎敢忘戎事。經國應知有大猷。

105

〈大閱圖〉的繪製，正是即位初期的乾隆皇帝用來提醒自己，身為帝王之尊，不可忽視軍旅之事，因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詩文曰：「承平詎敢忘戎事」；另方面乾隆皇帝也向天下臣民展示，他有著經營天下的雄心壯志，故詩文曰：「經國應知有大猷」——這也正是「大閱」典禮之所以要舉行的宗旨。然嘉慶十七年以降，清廷再無舉行「大閱」的紀錄，晚清國力的日見陵夷，是否與此有關？值得深思。

¹⁰⁵（清）清高宗撰，《御製詩初集》（收入：清高宗勅撰《四庫全書》第1302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本，1986），卷2〈大閱〉P.12。

附 圖

圖 1 〈乾隆南巡圖卷〉第十二卷（局部）

圖 2 〈大閱第二圖列陣〉（局部）

圖 3 〈大閱第三圖閱陣〉（局部）

圖 4 〈大閱第三圖閱陣〉中八旗大營之正藍旗

圖 5 〈萬樹園賜宴圖〉（局部）

圖 6 〈大閱第三圖閱陣〉戎裝馭馬的乾隆像

圖 7 〈春郊閱駿圖〉（局部）

圖 8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萬吉驪〉

圖 9 〈大閱第三圖閱陣〉張曲柄黃蓋之武備院執事者

圖 10 〈大閱第三圖閱陣〉隨行之王公文武大臣

圖 11 郎世寧〈乾隆大閱圖軸〉

圖 12 〈木蘭圖〉第一卷行營中騎馬的乾隆像

參考書目

一、基本史料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王欽若、楊億等編《冊府元龜》，臺北，大化書局，1984年。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清高宗勅撰《御製詩初集》，收入：高宗勅撰《四庫全書》第1302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本，1986。
- (清)清仁宗勅撰《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
- (清)王杰等輯《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年。
- (清)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式》，卷十三〈武備一〉，收入：(清)董浩等纂修《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二十冊，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年。
- (清)朱彝尊撰，(清)英廉等增補《欽定日下舊聞考》，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
- (清)李鴻章等編修《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檔》。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呂堅、賓長初、蔣曉玉著，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于德源著，《北京歷代城坊、宮殿、苑囿》，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7年。
- 方詩銘、王修齡輯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3年。
- 王耀庭主編，《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年。
-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第六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 畢梅雪、侯錦郎著，《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
- 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年。

(二) 期刊論文

- 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族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2，2006年冬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P.51-108。
- 侯怡利，〈〈大閱第三圖—閱陣〉—乾隆四年閱兵典禮紀實〉，《故宮文物月刊》295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年，P.16-23。
- 劉 潞，〈《從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4，北京，故宮博物院，2000年，P.15-26。